

收稿日期:2021-09-25

词集重刊与词坛新貌 ——论雍乾年间的“山中白云”风

黄浩然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摘要:从康熙六十一年到乾隆元年,曹炳曾、赵昱在十五年间三次重刊张炎的《山中白云词》,使其流传未广的局面得以改观。在重刊过程中,厉鹗、赵昱、赵信等人充分发掘历史文献,奠定了有关张炎生平研究的大致格局。在多次重刊之后,雍乾词坛对张炎的关注逐渐从《词综》转向《山中白云词》,词人在创作中反复提及“山中白云”,追和的对象几乎遍布《山中白云词》,集山中白云词也开始出现。

关键词:张炎;《山中白云词》;重刊;生平;雍乾词坛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2)02-0079-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南宋雅词在清代的经典化研究”(17CZW030)。

作者简介:黄浩然(1984—),男,江苏泰州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宋代、清代文学与文献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2.02.025

明清之际,“世人言词,必称北宋”。以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诸家,通过蒐集、整理、展示以姜夔、张炎为代表的南宋雅词,宣扬“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的词学主张,有力地扭转了当时的词坛风尚^{[1]发凡}。通常而言,词人的创作一般经由选本和别集呈现,因此,浙派对词人词作的整理不仅体现在选本的编纂上,也体现在别集的修订上。这种努力在张炎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朱彝尊等人从各种渠道获得张炎《玉田词》的四种抄本,在《词综》初刻本中选录众多张词;其后又获得张炎词足本——《山中白云词》,不仅加以整理、刊刻,而且在《词综》补遗中予以增选。康熙五十六年(1717),《词洁》的编者先著在追述康熙初年的词风转变时就特别提及张词:“四十年前,海内以词名家者,指屈可数,其时皆取途北宋,以少游、美成为宗。迨山中白云词晚出人间,长短句为之一变,又皆扫除秾艳,问津姜、史。”^[2]随着浙西一派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张炎在康熙词坛逐步获得前所未有的词史地位,清人的次韵之作也随之大量涌现。不过,这些词作的次韵对象基本集中在《词综》所收的张词,超出《词综》范围的张词则相对较少。出现这样的局面,与《词综》的选本性质有关。一方面,《词综》所收录的张炎词作虽然远不能与《玉田词》《山中白云词》相比,但这些词作经过朱彝尊等人的精挑细选,更能体现浙西一派的论词旨趣;另一方面,《词综》和《山中白云词》推出之时,北宋词风仍占据文坛主流,浙派之外的词人更易被《词综》中的张词吸引,尚

无暇顾及其别集。不过，这也反映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张炎的词别集相对而言流传未广。康熙四十四年(1705)，杜诏奉命分纂《御选历代词》，始得朱彝尊所寄《玉田词》抄本，“时亦未知有‘山中白云’名目也”。到了康熙四十八年(1709)，杜氏在奉命修纂《钦定词谱》时才因同馆楼俨之故得见《山中白云词》^{[3]171}。而从康熙六十一年(1722)到乾隆元年(1736)，《山中白云词》在十五年间重刊三次，其作为足本别集的优势才逐渐显现。

一、《山中白云词》的重刊

《词综》初刻本所据《玉田词》并不完备，朱彝尊颇以为遗憾：“顷吴门钱进士宫声相遇都亭，谓家有藏本，乃陶南村手书，多至三百阕，则予所见，犹未及半。漏万之讥，殆不免矣。”^{[1]炎凡}朱氏所见，乃是钱中谐所藏陶宗仪手书本。李符《龚刻山中白云词序》记载了整理过程：“越数年，复睹《山中白云》全卷，则吾乡朱检讨竹垞录钱编修庸亭所藏本也。累楮百翻，多至三百首，始识向购特半豹耳。参殷孝思璧全一语，更阅陆辅之《词旨》载乐笑翁警句奇对，无有出于是编之外者，知为完书无疑。竹垞厘卷为八，与诸同志辨正鱼鲁，緘寄白门，余复与龚主事衢圃取他本较对，或字句互异，题目迥别，则增入两存之，锼枣以传，可称善本。继又从戴帅初、袁清容集内得赠序疏与诗，因附刻于后，而其生平约略可见。”^{[3]167}尽管卷首殷重《玉田词题识》称是编“几经兵燹，犹自璧全”^{[3]166}，但整理者还是根据陆行直的《词旨》做了必要的考辨。在“厘卷为八，与诸同志辨正鱼鲁”之后，朱彝尊将其“緘寄白门”，由李符、龚翔麟“取他本较对”。除校勘之外，李、龚二人还从戴表元、袁桷集中辑得《送张叔夏西游序》《送张玉田归杭疏》《赠张玉田》“附刻于后”，以资知人论世。康熙十八年(1679)，《山中白云词》由龚翔麟附刻于《浙西六家词》之后。不过，这一词集在康熙早年间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直至康熙六十一年，上海曹炳曾城书室才将其重新刊行。

曹炳曾的《山中白云词序》详述了重刊的缘起：“曩者余友简兮陆先生相契甚笃，朝夕过从，讨论古今乐府诗余，必推玉田张叔夏，一日出《山中白云词》见示，乃先生手录披阅者。曰：‘世无善本，何锼枣以传！’余曰：‘唯唯。’时犹习举子业，未尝专读古书，不知叔夏为何时人也。未几，先生与子源亭相继谢世，欲求所谓玉田词者，杳不可得。间尝披阅词选，得见数阕，觉慷慨洒落，于周待制、柳屯田诸名家外，别出蹊径，而律吕调谐，一一应声叶节。追忆简兮之语，为太息自悔者久之。去年秋，有客以残编数种求售，翻阅未竟，忽睹此卷，正畴昔先生所手编者，不禁狂喜，亟购得之，以付廉儿。于是复叹四十年间人之存亡，书之离合，莫不有数存乎其间。而《白云》一帙，若终有待于余也。会余刻《海叟诗集》，因将此编重加参订，附以《乐府指迷》、名贤诗序赠别之作，精书镂板，以酬宿诺。”^{[3]170}“简兮陆先生”即陆敏时，“字子逊，尝读《诗》至《简兮》之什，见贤者不得志而仕于伶官，有轻世肆志之心，心窃慕之，因自号为简兮”^[4]。陆敏时与曹氏昆季过从甚密，陆氏过世之后，炳曾之弟煥曾作《沁园春·挽陆简兮》表达哀恻之情。陆敏时曾向曹炳曾推荐《山中白云词》，只不过曹氏当时“犹习举子业，未尝专读古书”，甚至不知张炎为何时人。后来，曹氏“披阅词选”时得见张炎词，认为其词“律吕调谐，一一应声叶节”，于柳永、周邦彦之外“别出蹊径”，此时“追忆简兮之语，为太息自悔者久之”，而“欲求所谓玉田词者，杳不可得”。康熙六十年(1721)，在机缘巧合之下，曹炳曾重获陆敏时“所手编者”，重新参订并予以刊行。

对于曹炳曾所述，学界存在一些质疑。吴则虞先生在谈及陆简兮校本时指出：“此本与龚本相出入者仅数处，不过十数字耳。八卷之分，既出自朱氏，校订之役，实成于李符，又何以简兮自居其功耶？窃疑陆氏之书，实即龚本略加批校而已。巢南付刊时，恐未见龚本，故误为陆氏所编次。眉首行间，陆氏或有校语，惜未刊出。”^{[3]213-214}对此，郑子运有着不同的看法：“陆简兮抄本并不是出自龚刻，因为李符序龚刻本云：‘继又从戴师初、袁清容集内得送赠序疏与诗，因附刻于后，而其生平约略可见。’陆抄若出自龚刻，陆氏又常在曹氏面前揄扬张炎词，曹氏不当‘不知叔夏何

时人也’。陆抄本后来遗失,曹氏从书肆中所购为龚刻本,而曹氏误以为与陆抄本相同,吴则虞据此误以为陆氏剽窃了龚刻本的成果,遂使陆氏衔冤地下。曹刻的卷数分合、加注的异文,与龚刻完全相同,而且全载龚刻的序文,所以,曹刻出自龚刻。”^[6]

探讨这一问题之前,要将龚本和曹本进行全面的比对。吴则虞在整理《山中白云词》时以龚刻为底本,参合了包括城书室本在内的诸多版本。在其校勘记中,龚本和曹本的异文如下:

(一)卷一《琐窗寒·旅窗孤寂,雨意垂垂,买舟西渡未能也,赋此为钱塘故人韩竹间问》“试香温”:曹刻本“香”“温”互倒,同《词综》及水竹居本。^{[3]16}

(二)卷二《还京乐·送陈行之归吴》“醉吟处”:曹本“吟”作“游”,水竹居本、四印本作“胜游多处”,《词谱》亦作“胜游”。^{[3]34}

(三)卷二《长亭怨·为任次山赋驯鹭》“朝回花径”:龚本作“花□”,曹本作“花径”,许本同,水竹居本作“花底”,四印本亦作“花底”,兹从许本。^{[3]39}

(四)卷四《意难忘·中吴车氏号秀卿……》(别本)“明月又谁家”:曹本、宝书堂本、许本“明月”作“明日”。^{[3]73}

(五)卷五《壶中天·月涌大江》“鸥犹栖草”:曹本、《历代诗余》“鸥”并作“泓”。^{[3]100}

(六)卷六《满江红》(近日衰迟)“顿荒松菊”:“荒”,曹、许本注云:“一作就。”龚本无。^{[3]120}

(七)卷七《水调歌头·寄王信父》“化机消息”:曹本“机”作“几”。^{[3]123}

(八)卷八《思佳客·题周草窗〈武林旧事〉》“汉上重来不见花”:曹本“重”作“从”。^{[3]144}

(九)卷八《渔歌子·十解》(其五)“更无人识老渔翁”:曹本“识”作“说”。^{[3]146}

从这九条异文来看,两本之间的差别确实如吴则虞所言,“仅数处,不过十数字耳”。两本之间极高的相似程度表明,曹本或者曹本所据的底本源于龚本。由于曹炳曾称底本乃“畴昔先生所手编者”,且曹序并未言及龚本,因此可以说,曹氏所据的底本——陆敏时所“手录披阅者”——源于龚本。至于两者之间为数不多的差异,大致可以分为两类情况。一类是曹氏“重加参订”的成果,前六条当属此类。周中孚称曹氏“家多藏书”^[6],这些与龚本的相异之处应该是参合了当时的相关文献,比如《词综》《历代诗余》等。另一类是传抄、刊刻过程中出现的异文,后三条当属此类。“机”与“几”、“重”与“从”、“识”与“说”,或形近、或音近,相对而言容易导致手录之误。

在厘清两者关系的基础上,我们重新来审视吴、郑之间的不同观点。吴则虞认为“陆氏之书,实即龚本略加批校而已”,“巢南付刊时,恐未见龚本”,都没有问题。不过,“误为陆氏所编次”之说恐怕难以成立。曹氏所谓“手编”,应当等同于上文的“手录披阅”,而非“编次”。换言之,曹氏应该并未认为陆敏时是《山中白云词》的分卷者和校订者。郑子运认为“陆简兮抄本并不是出自龚刻”,而“曹氏从书肆中所购为龚刻本”,都缺乏更有力的根据。曹氏自称当时“不知叔夏为何时人”,是因为“时犹习举子业,未尝专读古书”,对张炎不甚了解,不能将其作为“陆简兮抄本并不是出自龚刻”的理由。至于曹氏所购买到的“乃先生手录披阅者”,故而曹氏感叹“况我良友,手迹如新”。因此,所谓“曹氏从书肆中所购为龚刻本,而曹氏误以为与陆抄本相同”的观点也很难成立。

城书室本《山中白云词》刊行之后,曹炳曾将之赠予杜诏,杜“惊喜出望外”。雍正四年(1726),城书室本重刊之时,杜氏为之序,回顾自己与《山中白云词》的渊源,并阐述自己对张词的体认:“从此溯源北宋,研味乎淮海、清真,一归诸和雅。”^{[3]171}由此可见,杜诏的思路与朱彝尊很不相同,他是经由张词溯源北宋、研味秦周,这在康熙词坛其实颇具代表性^[7]。

乾隆元年,仁和赵昱宝书堂本《山中白云词》刊行。卷首厉鹗《山中白云词题辞》云:“元张炎叔夏《山中白云》八卷,吾乡龚侍御衡圃得钞本于秀水朱检讨竹垞,因镂版以传。侍御晚节家居食贫,物故后,琴书散落,是版几入庸贩手,吾友赵君谷林幸购得之。谷林好蓄僻书,必留其真,力于

校勘，复弗吝流布人间，可谓得所归矣。”^{[3]168} 龚翔麟晚年贫困，身后“琴书散落”，所刻《山中白云词》雕版辗转流传，后由赵昱购得。赵氏“好畜僻书”，“弗吝流布人间”，据之刷印以行，故赵本的行款与龚本一致。厉鹗对版本源流的介绍虽然无误，但也遮蔽了一些信息。他只提到“吾乡龚侍御衡圃得钞本于秀水朱检讨竹垞”，但并未言明朱彝尊本源自钱中谐藏本，其中或许有言外之意。根据厉鹗的叙述，《山中白云词》流传线路是：秀水朱彝尊→钱塘龚翔麟→仁和赵昱，如此一来，钱塘厉鹗所参与的这次重刊活动就具备了传承浙西词派统序的意味。

十五年间的三次刊行，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山中白云词》自刊本问世以来流传未广的局面，这也为张炎在雍乾词坛影响力的扩大提供了有力的文献支撑。

二、张炎生平的深入研究

浙西词派的形成，以《词综》编纂为重要标志。《词综》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不再按类、调编次，而是按人编次。这一体例的确立，使得词人生平的考订成为编纂者的一项重要工作。而在别集整理的过程中，有关词人生平的研究显得更为重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学界只能通过概略的记载来了解张炎的生平。而在发现足本词别集之后，龚翔麟就在其《刻山中白云词序》中开展了相关考订工作^{[3]167-168}。《山中白云词》卷八有《风入松·久别曾心传，近会于竹林清话，欢未足而离歌发，情如之何？因作此解。时至大庚戌七月也》，有《临江仙·甲寅秋寓吴，作墨水仙，为处梅、吟边清玩。时余年六十有七，看花雾中，不过戏纵笔墨，观者出门一笑可也》，“则此甲寅实元仁宗延祐元年也”，龚翔麟据此推算出“宋理宗淳祐戊申为玉田生始生之岁”。龚氏查阅《宋史》，知张俊有五子，然“玉田生出谁后”，尚无法考证。《山中白云词》卷一有《甘州·庚寅岁，沈尧道同余北归，各处杭越。踰岁，尧道来问寂寞，语笑数日，又复别去。赋此曲并寄赵学舟》和《疏影·余于庚寅岁北归，与西湖诸友夜酌，因有感于旧游，寄周草窗》，龚氏据以称张炎“至元庚寅始返江南”。《甘州》《疏影》两阕亦见于《百家词》本《玉田词》，不过其中的“庚寅”均作“辛卯”。龚翔麟整理《山中白云词》时虽然“取他本较对”，但他并未将上述异文校记，而是将张炎北归时间遽定为庚寅，有失审慎。而谢桃坊则根据《大观录》证明，“张炎于辛卯春尚在燕蓟”^[8]。

那么，浙西诸家如何赋予祖籍陕西的张炎一个浙西的身份？通过考订，龚翔麟解决了这一问题：“其先虽出凤翔，然居临安久，故游天台、明州、山阴、平江、义兴诸地，皆称寓、称客，而于吾杭必言归，感叹故园荒芜之作，凡三四见，又安得谓之秦人乎？”朱彝尊《鱼计庄词序》有类似表述：“在昔鄱阳姜石帚、张东泽、弁阳周草窗、西秦张玉田，咸非浙产，然言浙词者必称焉。是则浙词之盛，亦由侨居者为之助。犹夫豫章诗派不必皆江西人，亦取其同调焉尔矣。”^[9]虽然龚翔麟对张炎生平的考订稍有不妥之处，但其在这方面的努力毕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可惜的是，曹炳曾在刊行城书室本时并未作进一步的探究，对张氏的介绍仅限于“张叔夏，名炎，号玉田生，又称乐笑翁，西秦人，或云临安人”^{[3]170}。直至乾隆元年赵昱重新刷印龚本，有关张炎生平的研究才走向深入。

在龚翔麟《刻山中白云词序》的基础上，厉鹗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考订：

侍御序考叔夏生于宋理宗淳祐戊申，循王五子，叔夏未知出谁后。《宋史》不载，固无从考索。第袁伯长《送叔夏归杭疏》云：“古梅千榼，空怀玉照之风流。”玉照，张镃功甫堂名。功甫是循王诸孙，叔夏出功甫后无疑也。叔夏父名枢，字斗南，号寄闲，邓牧心《伯牙琴》中有《张寄闲词序》云：“子炎能世其学者是也。”功甫名偏旁从金，以五行相生之次推之，叔夏于功甫为三世，于循王为五世，与袁伯长赠诗注云“为循王五世孙”者相符矣。特功甫、斗南之父均未审耳。功甫生自朱门，儒雅好事，杨诚斋以“佳公子”“穷诗客”目之，有《玉照堂词》一卷，斗南所作六首，见弁阳翁《绝妙好词》，陆辅之《词旨》“属对”又载其“金谷移春，玉壶贮暖”，“拥石池台、约花兰榼”之句，今逸其全。叔夏声律之学，师承有自盖如此。邓牧心又云：“叔

夏《春水》一词,绝唱今古,人号之曰张春水。”孔行素《至正真记》云:“钱唐张叔夏尝赋《孤雁词》,有‘写不成书,只记(按,当作“寄”)得、相思一点’,人皆称之曰张孤雁。”二词今俱见集中,亦唐人“刘夜坐”“郑鹧鸪”之比也。附识于首,俟后之读《山中白云》者考焉。^{[3]168-169}

根据《山中白云词》中的词作和《宋史》的记载,龚翔麟推知“叔夏生于宋理宗淳佑戊申,循王五子,叔夏未知出谁后”。厉鹗认为“《宋史》不载,固无从考索”,故而他从精读已有文献入手。龚本《山中白云词》后附袁桷《送叔夏归杭疏》,其中有“古梅千槛,空怀玉照之风流”。玉照乃张镒功甫堂名,而“功甫是循王诸孙,叔夏出功甫后无疑也”。邓牧《山中白云词序》称“其父寄闲先生善词名世,君又得之家庭所传者”,但并未提及寄闲之名。厉鹗在邓氏《伯牙琴》中发现《张寄闲词序》,得知“叔夏父名枢,字斗南,号寄闲”^①。张镒之名从金,张枢之名从木,张炎之名从火,厉鹗其以五行相生为世次之名。厉鹗以为“功甫是循王诸孙”,故称“叔夏于功甫为三世,于循王为五世,与袁伯长赠诗注云‘为循王五世孙’者相符矣”,“特功甫、斗南之父均未审耳”。考证出张炎与张镒、张枢的关系之后,厉鹗又对镒、枢二人作了简介。镒“生自朱门,儒雅好事”,杨万里以“佳公子”“穷诗客”目之,有《玉照堂词》一卷,而枢“所作六首,见弁阳翁《绝妙好词》,陆辅之《词旨》‘属对’又载其‘金谷移春,玉壶贮暖’,‘拥石池台、约花兰槛’之句,今逸其全”。读《山中白云词》者由此得之,张炎于声律之学师承有自。邓牧《山中白云词序》称“《春水》一词,绝唱千古,人以‘张春水’目之”,此事在当时已人所共知。而孔齐《至正真记》载“钱唐张叔夏尝赋《孤雁词》,有‘写不成书,只记得、相思一点’,人皆称之曰张孤雁”,并不为人熟知。这里的《至正真记》四卷,乃元孔齐著,杂论元代朝野琐事。此书流传不广,赵昱、赵信小山堂藏有抄本^[10],厉鹗则善加利用。

赵昱《山中白云词题辞》^{[3]169}对张炎也颇有考订。他认为“词源于诗,未有词工不能诗者”,张炎“词清空秀远,绝出宋季诸名家上,意其诗必有可观”,因此,赵昱的探究基本集中在张炎诗作上。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二十二张鹿微条下云:“山居钞书颇多,著述甚富,予所见者,仅《玉光剑气集》《謏闻正续笔》数种而已。曩造其山居,见案头有手抄宋季张炎叔夏诗集一卷,今其遗书不可复问,诗亦流传者寡矣。”^[11]自此之后,张炎诗或已失传。经赵昱搜寻,仅在袁桷所纂《(延祐)四明志》发现其《题腰带水》一绝,“语意佳绝,且有承平故家之感”,颇可与其词相互参详^{[3]169}。

赵信的考订工作集中在有关张词的本事上,其《山中白云词题识》提及明汪珂玉的《珊瑚网》。是书卷三二名画题跋“陆行直碧梧苍石图”条云:“‘候虫凄断,人语西风岸。月落沙平流水漫,惊见芦花来雁。可怜瘦损兰成,多情只为卿。只有一枝梧叶,不知多少秋声。’此友人张叔夏赠余之作也,余不能记忆。于至治元年(1321)仲夏廿四日戏作《碧梧苍石》,与冶仙西窗夜坐,因语及此,转瞬二十一载。今卿卿、叔夏皆成故人,恍然如隔世事。遂书于卷首,以记一时之感慨云。季道陆行直题。”^[12]赵信将这段记载视作张炎《清平乐》一词的本事,固无可,但他似乎也忽视了其中的重要信息,即至治元年时张炎已下世。

从龚翔麟、厉鹗、赵昱到赵信,张炎生平研究日渐深入。其间,相关文献的搜集、研读起到了关键作用。借助邓牧《伯牙琴》,厉鹗根据五行相生之理推出张炎之世次;借助《(延祐)四明志》,赵昱辑得张炎佚诗一首;借助汪珂玉《珊瑚网》,后人获知张炎卒年之下限。当然,诸家考订也有不足之处,其后亦有学者予以辨证、补充。如江藩指出:“史浩《广寿慧云寺记》称镒为循王曾孙。石刻碑文后,有镒孙怪跋,盖以五行相生为世次之名者,始于功甫。……枢与怪名皆从木,是为弟兄行。木生火,故玉田生名炎也。以张氏世系计之,叔夏乃循王之六世孙。”^{[13]270}总体而言,上述讨论基本奠定了张炎生平研究的大致格局,后来丁丙等人虽然也有所推进,但多为锦上添花。

① 笔者所寓目《知不足斋丛书》本《伯牙琴》有《张叔夏词集序》而无《张寄闲词序》,故厉鹗所见之版本当与此不同。

三、雍乾词坛的“山中白云”风

尽管张炎的词坛地位在康熙年间已经确立,但《山中白云词》当时的影响力并不大。在《全清词·顺康卷》及其补编中明确提及“山中白云词”的只有两首,分别为邵瑛的《声声慢·题山中白云词》^{[14]9302}和杜诏的《壶中天·再用前韵志别,并简缪虞皋》^{[14]11191}。而随着《山中白云词》的多次重刊,“山中白云”在《全清词·雍乾卷》中出现频率明显提高。首先,雍乾词坛有不少题《山中白云词》之作,比如郑沅有《月下笛·玉田〈山中白云词〉题后》^{[15]5345},李澧有《芙蓉曲·题张玉田〈山中白云词〉卷》^{[15]6487}。其次,词人在创作中主动提及己作与张词的渊源。朱彭有《曲游春·访陆氏皆山楼遗址》^{[15]1842},其小序云:“宋季澄江陆起潜与张玉田交好。玉田《山中白云词》有题起潜皆山楼四景,及重登皆山楼作,云:‘楼面惠山,而澄江之山,自北而东,自东而南,萃嶽清丽,应接不暇。西有大江,月白潮生,对之神爽。’余久客此,遍访土人,俱不知有斯楼之名,又何从觅其遗址耶?聊作此解,以贻后人。”朱词以“遥思排闥青来,伊人遥隔”为结,句下自注云:“‘看排闥青来,书床啸咏’,叔夏词中句。”(按,此句见于《山中白云词》卷六《摸鱼子·己酉重登陆起潜皆山楼正对惠山》,即朱氏所谓“重登皆山楼作”。)再次,品评时人之作常以“山中白云”为美学典范,比如金兆燕《醉太平·题李端舒词集》有“琅笺句新。瑶音字芬。知君词客前身。定山中白云”^{[15]990},李澧《洞仙歌·题王麟洲〈珠尘乐府〉》有“竹翁遗调在,琴趣茶烟,只许山中白云并”^{[15]6434}。

“山中白云”在词作中的反复出现,表明《山中白云词》在雍乾词坛的流传程度远超康熙词坛,而这一点在词人的追和之作中也表现得相当明显。

在《全清词·顺康卷》及其补编中,词人对张炎的追和基本集中在《词综》所收录的张词。超出的十余首可以分为两类:一部分词作的追和对象既见于《玉田词》又见于《山中白云词》,而康熙年间《玉田词》尚易觅得,其流传程度甚至超过《山中白云词》,因此这类作品的出现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山中白云词》的刊行;另一部分词作的追和对象仅见于《山中白云词》,包括查慎行的《新雁过妆楼·赋菊,用玉田旧韵》^{[14]9119}、邵瑛的《绿意·荷叶,用玉田韵》^{[14]9319}、《渔歌子·用玉田韵》(十首)^{[14]9321}、《木兰花慢·吴快亭书来,知其客登州,词以怀之,用玉田韵》^{[14]9335}、吴贯勉的《台城路·登鸡鸣寺,用玉田游北山寺韵》^{[14]10035}。其中,邵瑛追和的《绿意》在《词综》中归属无名氏,《山中白云词》卷六有《红情·〈疎影〉〈暗香〉,姜白石为梅着语。因易之曰“红情”“绿意”,以荷花荷叶咏之》,吴贯勉追和的《台城路》虽然并不只见于《山中白云词》,但是《玉田词》卷上作《台城路·雪窦寺访同翁日东岩》,而《山中白云词》卷二作《台城路·游北山寺》。到了雍乾时期,越来越多的词人开始追和《山中白云词》中的张词。这些追和之作中有两类现象值得注意。一方面,《山中白云词》超出《玉田词》的那一百四十三首词日益受到关注,比如王又曾有《台城路·舟中望惠山,用玉田韵》^{[15]679},方成培有《八声甘州·用玉田韵》^{[15]1726},陈朗有《柳梢青·咏雪,和〈山中白云词〉韵》^{[15]4353};另一方面,对《词综》与《山中白云词》的相异之处,词人开始倾向于后者,比如詹肇堂有《探芳信·春日过东城汪氏园林,追忆丁亥夏日,与沈椒园先生、卫卓少明府觞咏于此,今二十年矣。椒园先生已归道山,卓少明府尚官粤西,存歿聚散之感,黯然于怀。因歌此曲,即用张玉田西湖春感韵》^{[15]1937}和《八声甘州·坠花堕絮,绝影东风,追念昔游,迥如天上。凄然身世之感,不独悔北辕南柁之劳劳也。用玉田生北游归别沈尧道韵》^{[15]1958},其追和的两首词在《词综》中分别作《探芳信·次周草窗韵》《甘州·钱沈秋江》,而在《山中白云词》中分别作《探芳信·西湖春感,寄草窗》《甘州·庚寅岁,沈尧道同余北归,各处杭越。逾岁,尧道来问寂寞,语笑数日,又复别去。赋此曲并寄赵学舟》。种种迹象或许可以表明,《山中白云词》在重刊之后获得了更多的关注。

在《山中白云词》广为流传之后,一种与《山中白云词》紧密相连的现象应运而生,那就是集山中白云词。集句词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宋代的王安石,谢章铤指出:“第考之《临川集》,荆公已启其

端。咏梅《甘露歌》三首,草堂《菩萨蛮》一首,皆是集句。……蘅圃《题〈蕃锦集〉》云:‘是谁能纫百家衣,只许半山人说。’当是指此,非泛言诗中集句也。”^{[13]3467}据学者初步统计,“宋词人有集句者即有王安石、苏轼、赵彦端、张孝祥、杨冠卿、辛弃疾等六七家之多”,不过,“宋人为集句词既乏规模,造诣也不高,尚处于形式上探索、价值上轻忽的拓荒阶段”^[16]。到了清代康熙年间,朱彝尊“集唐人诗句,自一字以至十余字,辘成小词”,“长短自合,宫商悉谐,似唐人有意为之,留以待锡鬯之驱使”,其《蕃锦集》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超前贤^[17]。到了乾隆年间,集句词又出现了新的变化,“通阕只集一人之句者”开始出现,其中“一人”就是张炎,而集句者以江昉为代表。

江昉,字旭东,号研农,又号橙里,安徽歙县人。寓居扬州,与厉鹗、王又曾等过从甚密,有《练溪渔唱》二卷、附《集山中白云词》一卷。金兆燕《集山中白云词序》云:“然捋扯诗句,不过五言七言;若排比词家,或易同音同调。未有抉百弓之畎浚,另起波澜;卸七宝之楼台,自为榱桷,如橙里词人之集玉田词句者也。”^[18]相对而言,集词句成词的难度要比集诗句成词高一些,而“通阕只集一人之句”的难度也就更高。比如,其《摸鱼儿·月夜登金山》云:

舫孤篷、水平天远,古台半压琪树。石根清气千年润,禅外更无今古。浮净宇。对此境尘消,江影沉沉露。停杯问取。任一路白云,炯然冰洁,空翠洒衣屦。凭阑久,说与霓裳莫舞。此时心事良苦。浦潮夜涌平沙白,落叶空江无数。还自语。听虚籁泠泠,无避秋声处。离情万绪。正独立苍茫,呜呜歌罢,小艇载诗去。^{[15]1627}

从词调到词题再到词句,这首词与《山中白云词》卷八《摸鱼子·为卞南仲赋月溪》颇为相近。张词云:

溯空明、霁蟾飞下,湖湘难辨遥树。流来那得清如许,不与众流东注。浮净宇。任消息虚盈,壶内藏今古。停杯问取。甚玉笛移宫,银桥散影,依旧广寒府。休凝伫。鼓枻渔歌在否。沧浪浑是烟雨。黄河路接银河路,炯炯近天尺五。还自语。奈一寸闲心,不是安愁处。凌风远举。趁冰玉光中,排云万里,秋艇载诗去。^{[3]138}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除了“秋”与“小”的区别外,江词在相同位置沿用了张词中的“浮净宇”“停杯问取”“还自语”“秋艇载诗去”。另外,《山中白云词》卷六《摸鱼子·己酉重登陆起潜皆山楼,正对惠山》上片末句为“空翠洒衣屦”,江词也与之完全一致。诸多的相同之处反映了通阕只集一人之句的难点所在:即便《山中白云词》拥有二百九十六阕,但这对集句者而言恐怕并不算多,毕竟集句过程中要考虑到词调、词题、词韵等多方面的限制。因此,金兆燕称江氏《集山中白云词》是“牵橘柚槐榆而为兄弟,杂金银铅汞而配丁壬”。江氏本人创作态度严谨,“笔不苟下,稿辄数易,剝鉢肝肾,磨濯心志”^{[18]沈大成序},自然比观者更能体会其中的难度,但他集张氏一人之句达一卷之多,这也充分体现了其个人对张词心慕手追的程度。

从“山中白云”乏人提起到反复出现,从追和对象主要集中在《词综》到几乎遍布《山中白云词》,从朱彝尊“集唐人诗句”以为词到江昉集山中白云词,张炎在雍乾词坛的影响力较之顺康大大提高。

四、结语

随着《词综》《山中白云词》的相继刊行,在浙西词派大力推尊下,张炎的典范地位得以确立。不过,康熙词坛对张炎的关注,更多集中在《词综》所收录的张词上,其《山中白云词》流传未广,连杜诏在参与编纂《御选历代词》时都“未知有‘山中白云’名目”。从康熙六十一年到乾隆元年,曹炳曾、赵昱在十五年间三次重刊《山中白云词》,在重刊过程中,厉鹗、赵昱、赵信等人充分发掘历史文献,奠定了有关张炎生平研究的大致格局。自《山中白云词》多次重刊之后,学界对张炎的关

注逐渐从《词综》转向《山中白云词》，雍乾词坛也呈现出新的变化：词人在创作中反复提及“山中白云”，追和对象几乎遍布《山中白云词》，集山中白云词的现象开始出现。因此可以说，《山中白云词》的重刊，无论是对张炎典范地位的提高，还是对雍乾词坛的发展，都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 [1] 朱彝尊,汪森.词综[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2] 程庭.若庵集(卷三)[M].清康熙间刻雍正间增刻本.
- [3] 张炎.山中白云词[M].吴则虞,校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
- [4] 张永铨.闲存堂集(卷一〇)[M].清康熙刻增修本.
- [5] 郑子运.张炎词集版本考[J].古典文献研究,2005(1):295-301.
- [6] 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七一)[M].民国《吴兴丛书》本.
- [7] 黄浩然.张炎词集整理与清初词风演进[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5(4):20-23.
- [8] 谢桃坊.张炎词集辨证[J].文献,1988(3):31-44.
- [9] 朱彝尊.曝书亭全集[M].王利民,等,校点.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455.
- [10] 阮元.文选楼藏书记(卷五)[M].清越缙堂钞本.
- [11]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M].姚祖恩,编.黄君坦,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705.
- [12] 汪砢玉.珊瑚网(卷三二)[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3] 唐圭璋.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5.
- [14] 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全清词》编纂委员会.全清词·顺康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2.
- [15] 张宏生.全清词·雍乾卷[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 [16] 马大勇.朱彝尊《蕃锦集》平议:兼谈“集句”之价值[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3(3):76-80.
- [17] 钱澄之.田间文集(卷一六)[M].清康熙二十九年刻本.
- [18] 江昉.练溪渔唱[M].清嘉庆九年刻本.

Anthology Reprint and New Trend of Ci Poem Creation during the Reigns of Yongzheng and Qianlong

HUANG Hao-ran

(School of Humanitie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7, China)

Abstract: Zhang Yan (1248 — 1320) was a Ci poet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who is famous for his anthology *Shan Zhong Bai Yun Ci*, which consists of 302 flowery and romantic Ci poems. It had been reprinted three times during the Reigns of Qing Emperors Yongzheng and Qianlong, popularizing the writer and his poems. Relevant historical materials have been found to support the research on Zhang's life story and literary creation. I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nfluential among poets and scholars, with abundant citations and references.

Key words: Zhang Yan; *Shan Zhong Bai Yun Ci*; reprint; life story; Ci-poetry circle during the Reigns of Yongzheng and Qianlong

〔责任编辑:王建霞〕